

哥特视角下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以安娜·伯恩斯的《送奶工》为考察对象

江佳仪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中国

【摘要】《送奶工》描绘了面对极端封闭政治环境、邪恶男性角色“送奶工”迫害以及社区流言蜚语的女主人公痛苦挣扎，逐渐成长的心路历程。本文从女性哥特的视角来解读文中女主人公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女性如何挣脱对自身的禁锢，并最终实现精神世界的独立。揭示了女性在男性权力社会下的生存困境以及女性通过内心力量实现主体意识的认知和建构。

【关键词】《送奶工》；女性哥特；女性意识觉醒

1. 引言

“哥特小说”的诞生起源于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于1764年创造的首部哥特作品《奥特兰托城堡》，其副标题“A Gothic Novel”（一部哥特小说），正式宣告了哥特小说的出现。而“女性哥特”则源于1976年女性主义理论家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在其著作《文学妇女》中首次将女性主义理论和哥特文学联系起来，将其定义为18世纪以来女性作家创作的哥特小说[1]。“可以说，‘女性哥特’的界定从一开始就更加注重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而弱化了传统哥特的超自然因素：它强调的是给女性个体带来焦虑和恐惧的‘幽灵’（haunting agency）不是非人的神秘力量也并非家族的罪恶史，而是来自现实生活中，源于性别角色的禁锢性规定以及以性别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女性空间的束缚，特别是父权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等”[2]。

《送奶工》是一部充满暴力、流言与抵抗的小说。这部作品以20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问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少女在北爱尔兰动荡时期被一个已婚的准军事组织成员“送奶工”骚扰的故事，以及社区内的流言蜚语让她陷入孤立，生活失控的痛苦。最终，“送奶工”死亡，少女摆脱了这段噩梦，重新找回自由和自我。《送奶工》并不是一部典型的女性哥特作品，但作品中对于女性角色在极端政治封闭环境下所遭受的困境以及邪恶男性角色的迫害与女性哥特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困境是相同的。而在封闭环境下，女性的成长成为女性哥特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也将女性哥特小说视为“成长小说”。莫尔斯认为，女性哥特小说通常以年

轻女性为中心，讲述她们如何在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和个人危机中成长，这些经历成为她们发展和自我发现的催化剂，最终实现自我心智上的成长[1]。这些叙事通常探讨身份、自主权和对父权制约束的斗争，使其与传统的成长主题产生共鸣。

2. 禁锢：封闭环境下的性别压迫和生存困境

在女性哥特小说中，故事主要通过邪恶男性角色对女性角色的迫害的情节展开。“读者对事件的理解往往被局限在主人公的视角，文本聚集于女性的恐惧与焦虑”[3]。就如伯恩斯笔下的主人公，面对着极端的政治环境下对女性角色的固化，封闭社区中的监视与流言，哥特式男性邪恶角色的凝视侵犯，以及来自家庭父权制顺从者的规训。由大到小，层层叠加的压迫，织成一张严密的网，其中充满告密者、爱打探的邻居、准军事组织、爆炸、谣言等等，将女主人公困在封闭的环境中难以逃脱[4]。

首先，伯恩斯将《送奶工》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个充满暴力和紧张气氛的社区，文中并没有点明具体所在地，不过根据作者的经历不难联想到伯恩斯出生所在的贝尔法斯特以及暴力北爱尔兰地区“问题”时代（指1960-1990年代在北爱尔兰的长期暴力活动）。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庸，“这里严格规定着女孩对男孩、女人对男人、女孩对男人可以说什么，以及不可以说什么”，“在这里，人们不会容忍那些被认定为不服从男人、不承认男人的权威，甚至放肆到几乎要反抗男人的女孩[5]”。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背景下，封闭而紧张的社区环境使得社区成员之间缺乏信任，流言蜚语成为他们消遣和行使权力的方式。“这个地

方总有人在不停地打探每个人的事情。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涨起，落下，来了，离开，继续追逐下一个目标”[5]。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机制与话语暴力，将“中间姐姐”置于一个无法逃脱的凝视场域中，她的行为和选择被不断审视和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环境的封闭性与邪恶男性角色的凝视交织，共同构成了对女主人公的心理压迫。“在父权制社会中，凝视的主体被男性所垄断，女性则沦为被凝视的客体”[6]。而“送奶工”这一男性角色的出现，将这种性别化的权力关系推向极致。他通过信息收集与行为监控构建监视网络，以言语暴力与身体威胁强化权力不对等。“有一种姑娘总让人好奇‘她是谁’，你就是那种姑娘，不是吗？你父亲叫那个啥啥，对吧？你那些兄弟，……，没错吧？”[5]。“送奶工”第一次出现就对中间姐姐家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从言语试探到以汽车炸弹谋杀准男友相威胁，“送奶工”的行径清晰展现，男权社会下男性暴力如何借凝视与威胁的双重机制，将女性禁锢于恐惧与焦虑的牢笼之中。

然而，这种压迫机制并未止步于个体层面，而是通过社区舆论的发酵进一步加剧。当“送奶工”对她的骚扰曝光后，流言迅速演变成集体暴力，将“中间姐姐”置于道德审判的风口浪尖。社区居民对她的评价充满了偏见和恶意，将她与“送奶工”的关系定义为“堕落”和“危险”[6]。这种压迫机制在家庭场域中得到了进一步延伸与强化。在伯恩斯笔下，家庭是父权制压迫的重要场域，承载着性别压迫的代际传递。作为父权制的顺从者，母亲和姐姐不仅未给予“中间姐姐”庇护，反而沦为帮凶。这种代际间的女性压迫关系，正是父权制对女性深度渗透与规训的有力佐证。

在“中间姐姐”遭受“送奶工”骚扰时，母亲和姐姐的态度暴露其帮凶的角色。“她一个劲儿地劝我行为检点，……，别和什么男人都搞在一起”，“什么是你作为女性的命运？日常家务，普通任务，生几个孩子”，“婚姻是天赐的判决、集体的任务以及职责。生几个有正确信仰的孩子，承担责任，忍受限制、局限和障碍”[5]。这类家庭内部的规训话语，既凸显父权制对女性主体性的压制，也揭示了女性如何被异化为父权制的维护者。

在多重压迫机制的叠加效应下，中间姐姐不仅遭受外部环境的压迫，内心也陷入焦虑与恐慌。而这些困境恰恰成为她内心成长的催化

剂，促使她最终成功逃离。

3.挣扎：困境中的无声呼救和求助失败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中间姐姐最初对“送奶工”的关注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和不安。其心理反应根源于极端政治环境对女性身份的刻板化规训。这种禁锢感是女性哥特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女性角色常常与试图定义她们身份的压迫力量进行抗争[7]。在这种心理恐惧的禁锢下，中间姐姐作为哥特环境下的弱势女性角色，她选择了沉默作为自我保护机制，试图通过孤立来抵御外部威胁。

伯恩斯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出中间姐姐在封闭社会与流言压力下“无法言说”的女性形象。例如，面对“送奶工”的威胁时，她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焦虑却无法言说。“就在那时，我的脊椎开始震颤……，触及神经的恐惧和无孔不入的渗透在我大腿和屁股上弥漫开来”[5]。她的沉默并非完全的被动，而是极端压迫下的自我保护。“我不问任何问题，也不回答任何问题，不肯定，也不否认。通过那种方式，我说，我希望能孤立自己、保护自己”[5]。“在这样的一个集体当中，他们的每一次行动、每一种回答都可能成为某种宣言并被强加某种立场，由此沉默所代表的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反而成为最折中的选择。这种沉默虽然是受到外部环境压力下的权宜之计，却也仍旧是自主的选择”[8]。此后，中间姐姐刻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我比平时早出门，……，搭乘另一辆公共汽车去镇上”，“生平第一次，我没有走路看书。我没有走路”“另一个变化是我也没有按时跑步……万一他又出现在水库公园里呢”[5]。这种无法摆脱的纠缠以及社区中的流言蜚语，使她深陷孤独无助的境地。

中间姐姐试图与家人和朋友倾诉求助，却未获积极回应。“妈一直看着我，没有打断我。但是一等我说完，她就毫不犹豫地说是个骗子，说这个谎言只是对她进一步的嘲笑”[5]。最久的朋友听完倾诉，却认为事情的重点在于中间姐姐的“走路看书”的习惯。在社区层面，中间姐姐同样感受到了来自父权社会规范的压力。社区居民无端指责她的行为，肆意传播流言。这种集体性的诬陷与压迫，使中间姐姐意识到，她面对的不仅是个人困境，更是整个社会对女性的禁锢。

在极端的压迫和孤立中，中间姐姐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她逐渐意识到，社区和父权结构对她的压迫并非不可动摇，而她也并非完全无力反抗。“我是一个出格者……这样一种东

西都是谎言得以滋生的土壤,就是大家不愿意相信人有可能会有其他的生存的可能性,有其他的生存状态,有他的自由的诉求”[5]。而法语老师“天空不只有蓝色”的教导,恰似启蒙之光。这种对自由的诉求和对多样性的认同,标志着中间姐姐从被动受压迫转向主动寻求自我解放。

4. 逃离: 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与反抗

伯恩斯笔下,中间姐姐在“送奶工”的胁迫与社区流言的双重困境下,其心理与行为轨迹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从恐惧中挣扎求助,到完成精神层面的自我成长与“逃离”。她于困境中重塑了自我主体性,彰显出女性个体在男权压迫下的抗争精神与自我救赎的力量。迪亚娜·赫费勒(Diane Long Hoeveler)也认为在女性哥特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通常具有特定的叙事模式:她们通常出身低微,身处困境,并在男性哥特式人物的压迫中逐渐成长,最终实现自我成熟与精神上的解放[9]。

在经历了前两个阶段的困境与挣扎后,中间姐姐开始表现出对社会规范的抵抗。从着装选择到人际交往,她通过拒绝迎合社会期待,彰显出不断觉醒的自我意识。“送奶工”曾要求她穿着“有女人味的、性感的、优雅漂亮的连衣裙”,“而我会穿上运动服,中毒康复后第一次去马路另一头的三姐夫家”[5]。她挣脱了男性凝视下的性别枷锁,主动重塑自我身份[6]。这种抵抗既是对外在压迫的反击,更是她内心自我意识觉醒的具象化表现。

随着剧情的发展,“送奶工”意外死亡。社区对中间姐姐的恶意却并未消散,流言反而更加荒谬,然而她已达内心“平静”。她不再受男性威胁与社区流言困扰,而是通过内心反思和自我确认,重新获得了对自己身份的掌控和话语权。她重拾跑步,将流言蜚语统统抛诸身后。“‘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尽全力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我对眼睛感到厌烦,对某某之子感到厌烦,对规则和当地的规定感到厌烦”[5]。中间姐姐的转变不仅在于她对压迫的反抗,更在于她以积极姿态面向未来。她拒绝沉溺于过往伤痛,选择向前看。“我还说如果他执意纠缠过去,还把我也带回去,那就会延误我们的下一件事情——我们跑步就是下一件事情”[5]。这种对未来的积极态度,既是对痛苦的超越,更是自我解放的重要标志。

中间姐姐的自我解放,不仅体现为行为上的突破,更深植于精神的蜕变。在反抗社会规范与父权压迫的过程中,她从被动的受害者成

长为真正独立的个体。以自身经历诠释女性在面对压迫时迸发的强大内在力量。她夺回对自己身体和话语的控制权,构筑起防御壁垒,挣脱压迫的牢笼,实现了精神层面的逃离。最后,“我吸入薄雾的光芒,意识到它正在柔化,……,我几乎接近笑了”[5]。

《送奶工》以中间姐姐的视角,生动诠释了在极端的政治封闭环境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与家庭中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实现精神独立的可能性。小说借由中间姐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成长,勾勒出女性于父权社会中的三重抗争轨迹:“禁锢—挣扎—逃离”。首先,封闭社区内,男性凝视与集体规训形成双重枷锁,使女性身心俱缚;其次,当女性在压迫下无声挣扎,求助无门、陷入孤立;最终,主人公通过自我觉醒与精神反抗,完成对禁锢环境的精神超越。实现从“被凝视的客体”到“自我定义的主体”的蜕变。伯恩斯运用哥特式叙事,既揭露父权制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也赋予女性角色以隐秘而坚韧的反抗力量。这部作品深刻剖析了女性生存的困境,以中间姐姐的精神成长,彰显女性在面对压迫的内心力量,更是一曲对女性意识觉醒和精神反抗的有力赞歌。

参考文献

- [1]Ellen Moers. *Literary Women* [M]. New York: Oxford UP, 1976. 90-110.
- [2]林斌. 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论女性主义性别与体裁理论[J]. 外国语, 2005(2): 70-75.
- [3]Punter, David & Glennis Byron. *The Gothic* [M]. Malden: Blackwell, 2004.
- [4]李元. 析安娜·伯恩斯小说《送奶工》中的后现代女性成长叙事[J]. 外国文学, 2021(01): 14-24.
- [5]安娜·伯恩斯. 《送奶工》[M]. 吴洁静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
- [6]罗永婕. 凝视理论视角下《送奶工》中的女性身份认同[D]. 四川师范大学, 2022.
- [7]谢熠萌. 论《送奶工》中的暴力与女性生存困境[D]. 华中师范大学, 2020.
- [8]安天威. 于流言中沉默: 《送奶工》中的独语与失语[J]. 文学与文化, 2024(03): 102-111.
- [9]Hoeveler D L. *Gothic Feminism: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Gender from Charlotte Smith to Brontes* [M]. Philadelph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